

## “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

郝雨凡 王建偉

【編者按】郝雨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碩士和博士，曾任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麥克亞瑟研究員，美國科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政治科學教授及亞洲研究何鴻毅講座教授；先後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並為韓國漢城東亞研究所、日本國際大學、日本慶應大學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現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政治科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長期從事國際關係、中美關係、決策學、腐敗理論及澳門社會發展研究，出版多部中英文學術專著和編著，並有眾多學術文章在國際主要學術刊物中發表。中文主要著作有：《轉型中國的社會正義問題》、《澳門學引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30年回顧與展望》、《中國外交決策》、《布希的困境》、《白宮決策》、《瞬間的力量》、《限制性接觸》、《無形的手》等。

王建偉，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學士和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學博士。現任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曾任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主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史地文博校區政治系主任、終生杰出教授，並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日內瓦聯合國裁軍研究所、國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等重要智庫從事研究工作；曾經或正在擔任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上海美國研究所等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國外交、亞太安全、兩岸關係、美國外交等，發表了大量對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著述。

## 一、“特朗普現象”與美國政治制度

陳超敏（以下簡稱“陳”）：郝教授、王教授，您好！2016年是世界政治風雲變幻的一年，在美國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和選前大部分美國主流媒體以及專家的預測相反，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J. Trump）戰勝一直被看好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 D. R. Clinton），贏得了總統大選。您們對這次總統大選的結果感到意外嗎？特朗普為甚麼最終能贏得勝利？“特朗普現象”說明了甚麼？

郝雨凡（以下簡稱“郝”）：對於這個結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在選舉前的幾個月，我一直覺得特朗普（或者是任何人）對戰希拉里，都有勝選的可能——雖然到了選舉前一天，我仍然覺得希拉里的勝算較大——在這次選舉中，雖然美國主流媒體一面倒地認為希拉里會勝選，最後的結果卻大跌眼鏡，但實際上不少學者（包括美國和中國學者）也看到了希拉里的很多短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特朗普現象”不是偶然現象，它帶有一定的必然性。自冷戰以來，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小布什還是老布什，他們領導的美國在推動全球化等主流政策上，都產生了很多諸如貧富懸殊等的負面效果。全球化並非人人受益，得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階層，特朗普上台實際上也顯示出美國中下層社會對最近二十多年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理念的一種糾偏。我認為，這次大選把一些美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暴露了出來——有的學者把它看作是美國社會的整體撕裂，當然可以這樣理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理念上的爭議。前一階段美國的一些政策實際上使相當一部分的中下階層受益不大（甚至沒有受益），一些數據其實很能說明問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的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主要在說99%與1%的關係。在最近一輪的全球化進程中，實際上受益者只有1%，其他99%的人都沒有受益，這種現象不光發生在美國，而是在包括中國的全球範圍之中。這個社會現象在這次選舉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從選民選票上來看，希拉里佔有兩三百萬票的優勢，但在選舉人票上，她卻輸給了特朗普，其中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來美國自由主義泡沫的破滅。自由主義自身有一套政治話語，在美國社會當中，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其實是有高度限定的。這次選舉顛覆了過去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泡沫，很客觀地反映出當前美國民眾對前一段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的不滿。

王建偉（以下簡稱“王”）：在選前，美國主流媒體基本上一面倒地認為希拉里會獲勝，我們當然都會受到它們的一些影響，但是，如果不從選舉本身的結果來看，而是從美國政治的一個長期規律來看，這次結果並不很令人意外。美國是兩黨制，通常情況下一個黨執政兩屆，即八年以後就會換人，這個情況從戰後到目前為止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一次有一個政黨能連續三屆擔任總統。在民主黨連續執行八年之後，這一次，共和黨候選人獲勝原本應該是沒有甚麼懸念的，奧巴馬已經做了八年，美國老百姓一般的預期就是希望換人做做看，有一種求變的心態。就像奧巴馬在2007年提出的口號“變革”一樣，這次特朗普的競選口號同樣也是“變革”。因此，從美國政治的長期規律來看，這次大選共和黨獲勝不應讓人吃驚，只不過這一次共和黨推出了一個

非常另類的候選人——特朗普——他完全沒有政治經驗，是一個“政治素人”、純粹的商人；此外，他在個人品質方面也有很多的瑕疵。因此，美國的主流精英和媒體一開始並不看好他，認為這樣的一個人擔任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總統，好像有點不可想像，而結果恰恰就是他當選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有意外的成分，但是從美國政治的長期規律來看，它還是在情理之中的。

特朗普的獲勝也代表了美國國內民眾的一種社會思潮和一種情緒，主要是對全球化所造成的國內某種不平等的反抗。美國的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它們是全球化最早的倡導者，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一部分社會階層，特別是藍領工人階級其實沒有得益。美國的很多傳統產業都轉移到國外去了，還留在國內的產業也受到國外同類產品的高度競爭，於是他們或失去了工作，或無法較快地提高收入，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當特朗普在競選中說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這樣的話時，正好符合了這部分美國民眾的心理和感受。這也是為甚麼特朗普能夠在傳統工業集中、藍領工人失業比較嚴重的那些所謂“戰場”州或搖擺州中勝出的主要原因。在這次選舉中，特朗普在美國藍領工人階層當中的得票率，是戰後所有總統候選人中最高、比例最大的，可以說，他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藍領工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白人。應當指出的是，美國的工人階層並不完全是低收入者（收入更低的是黑人、西班牙裔人等少數族裔，他們大部分還是投票給希拉里的），但是藍領工人的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很多沒有大學學歷。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之所以支持特朗普，還在於他們認為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他們基本上是被忽視的。奧巴馬是黑人總統，比較關注少數民族的權益，而那些白人藍領工人覺得他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認為這個國家原本應該是屬於他們的。

此外，我認為美國民眾還有一種潛在的情緒，跟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關。在經歷了那場金融危機風暴以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一下子有了一點衰落的感覺，它在世界上的影響也相對減弱，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似乎都不按美國的意志在發展，美國想要管好像也管不了或管不好。美國人的內心不免會有一種失落感，特朗普提出要讓美國再一次變得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要重振美國的經濟及在世界上的雄風，這也迎合了國內部分民眾的上述心態，也是他能夠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郝：還有一點就是，這次選舉反映出民眾對美國現有的一種體制內的階層（**establishment**，香港稱為“建制派”）的不滿。美國政治體系、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的整體運作，產生了一個特殊的階層，這個階層應該如何定義，我們還不好說，大概可以叫做“政客階層”。此階層的存在有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為了競選，為了迎合民眾，他們在選舉時可以說假話、說大話，而上台後並不一定會兌現。此外，政客階層還會製造一些“話語”去左右民意，在制定政策時，主流媒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部分。這些人對某些價值觀非常執著，而實際上，就是他們製造了之前所說的自由主義泡沫，這些泡沫使很多美國人很討厭像希拉里這樣的政客。因此，不一定是特朗普，其他共和黨的候選人也有可能戰勝希拉里，因為她就是這個體制內的典型“政治精英”。也就是說，不喜歡這個體制，就不喜歡希拉里。

此外，這幾個因素也會疊加起來，除了貧富懸殊和全球化問題外，也存在着美國現有體制讓

人失望的問題。美國政治體制早期設計時，防止濫權為其主要目的。在18世紀後期的國際形勢之下，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在當時來說是非常進步的。這套體制在防止濫權方面非常有效，但當政府運作了二百年之後，它便越來越低效了。此種低效表現在其機制沉澱後出現了很多“規則”，使體制內的人很容易去把弄和操縱這個體制，更有甚者，這種對體制“規則”的操縱會使某一部分人受益，而大多數體制外的人則成為受害者或起碼是不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最近一輪的反體制行為便是這種情緒的表現。

現在，不管是社會福利還是其他的問題，任何一件小事在美國都要吵，國會和兩黨吵來吵去，政府效率便越來越低下。由於這樣的一種狀態，才導致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對現有體制失去信心或反感，這就是為甚麼像特朗普這樣的一個地產大亨、一個演藝界的億萬富翁能夠勝選的原因，這種現象背後也是普通民眾對現有體制表達的一種不滿。

王：每次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體制外的人，說要挑戰華盛頓的既有政治體制，要來進行鼎新革故。但是，很少候選人是真正的體制外的人，奧巴馬在當選前其實也算不上是體制外的人，因為他那時已經是參議員，而特朗普卻是一個真正的體制外的人，他沒有任何從政的經驗，沒有擔任過任何政府公職，這也許是他吸引選民的另一點。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就是想看看讓特朗普這麼一個政治素人來當總統，究竟會把美國治理成甚麼樣子，這也反映了美國部分民眾在對現存體制運作不滿的情況下的一種豪賭心理。事實上，他們把這次選舉當成了一次實驗。當然也可以說，特朗普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是美國的體制造就了他。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或許也是一個體制內的人。但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特朗普是一個靠剝削工人起家的億萬富翁，而有意思的是，美國的藍領工人階級居然會選擇他來代表他們，這99%和1%的關係如何去理解，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然而，特朗普到底會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做多少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個還真不好說。

陳：這次選舉引起了人們對美國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很多討論，希拉里的得票比特朗普多近280萬，但還是不能登上總統寶座，這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剛才郝教授也說了一些美國政治制度的優缺點，王教授，您對這方面有甚麼看法？

王：按照美國的選舉制度，特朗普是當選了，但他贏的是選舉人票，沒有贏得選民票，希拉里在選民票上比特朗普要多近三百萬張。也就是說，如果美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話，希拉里還是會有機會獲勝的。所以說，選前美國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率民調，實際上沒有與結果相差太遠。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的總統是由選舉人團間接選舉產生的，美國的先賢們為甚麼會設計這麼一個選舉人團制度，而不讓老百姓直接來選總統呢？主要是因為他們對當時美國的老百姓沒有太大的信心，對直接民主心存疑慮，擔心暴民政治，害怕老百姓會選出一個很奇怪、很極端的人來做總統。此外，他們還需平衡各州的權力，如果是直選的話，選民多的州便具有優勢，少數幾個大州幾乎可以決定選舉的結果，故需通過選舉人團機制來過濾選民的選舉偏好。這種機制造成了總統候選人可以輸了選民票，但是仍能當選。到目前為止，美國歷史上已發生過五次這樣的情況，前面三次都發生在19世紀，20世紀沒有發生過，因此當時沒有太多人關注這個

問題，而到了2000年的總統大選又再次發生。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贏得了選民票，但共和黨的小布什卻當選了。那次大選的結果有很大爭議，差點造成無法產生美國總統的憲政危機。佛羅里達州的計票風波，最後鬧到了美國最高法院。因此很多美國民眾認為，小布什的總統寶座是最高法院給的，而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僅僅相隔16年，同樣的情況又再次發生。這說明了隨着美國總統選舉中兩黨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得票差距的縮小，候選人贏得選舉人票而輸掉選民票的情況可能會更為頻繁地出現，從而帶來了更多關於“美國總統大選是否真的代表民意”的批評和質疑。另外，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美國自己也是間接選舉，但卻常常批評其他國家的類似制度不民主，因此也遭到人們詬病。

當然，美國的很多學者和民眾都認識到選舉人團制度的確存在問題，在很多方面已經落伍。但認識到問題是一回事，要解決問題又是另一回事。要改變這個制度，必需修改憲法，而在美國，修改憲法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難於修改憲法有它的好處，這可使國家的根本大法長期保持穩定，無法根據一時一事隨意變更，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使得美國憲法的某些條文很難適應新的情況。修改憲法需要提出憲法修正案，先要得到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然後還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議會的通過，所以修憲往往成爲拖上很多年的持久戰。這使很多人雖然有心修憲，但卻無力去推動。因此，在美國要修憲，除非舉國上下有很強的共識，否則很難成功。而在美國總統選舉制度這個問題上，出於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美國社會從政治精英到一般民眾都並沒有一個共識。因此，美國選舉人團制度就像其政治架構中的其他固有弊病一樣，除非真的出現憲政危機，不然很難改變。

## 二、特朗普與中美台關係

**陳：**特朗普成爲美國第45任總統。外界普遍認爲他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另類總統，會給美國的內政和外交帶來很大的變化。你們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獨特個性和背景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表了大量有關外交政策的言論，從這些言論中，我們能否看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性質、走向和特徵？此外，剛才我們也談到，一些候選人會在選舉的時候誇誇其談、講“大話”，你們認爲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會兌現他在選舉上的外交承諾？

**王：**當然，幾乎每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時都會講很多“大話”，而在當選後，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百分之百兌現當時的承諾，美國民眾也習慣了這種情況，而且他們也願意一次又一次地“上當”，把票投給那個許諾會給他們帶來更多變革的候選人，然而，他們其實也不指望當選者能夠不打折扣地兌現競選承諾。我的印象是特朗普競選時承諾較多的還是國內的問題，例如取消奧巴馬的醫保政策、降低稅收、修築墨西哥牆、修改移民政策，以及對所有伊斯蘭的非法移民進行甄別等。而在國際領域，他的主張並不是很多，比較明確的是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還有就是對中國說了一些重話，如說要把中國宣佈爲貨幣操縱國、對中國進口貨品徵收45%的高關稅等。當選後他已說了美國要退出TPP，但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把中國宣佈爲貨幣操縱國。

我估計他在一些國內問題上，爲了取信於民，會兌現他的一些承諾，例如奧巴馬的醫保政策或很多國內有關稅收、金融監管、移民等方面的法律，他應該都會動動手腳。但是，對很多外交問題包括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我認爲他應該不會貿然行事，因爲這牽涉到美國與很多其他國家的關係。例如，退出TPP以後，將來整個亞太地區的經貿關係將要怎麼處理？會有另外的一種多邊或雙邊的形式嗎？TPP的某些內容會否被撿回來？這些都不好說。但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上，我想他是不會貿然地馬上宣佈中國爲貨幣操縱國，他肯定會有一系列的緩衝措施。說實話，美國的老百姓也比較健忘，對政治人物在競選期間的承諾也不會太追究。特朗普可以根據當下的情況、內外形勢，用各種的理由來對兌現或不兌現他的承諾進行解釋。在外交事務上，如果真是要兌現他在競選時所說的某些話，例如讓歐洲、日本、韓國來承擔更多的同盟費用、撕毀和伊朗的核協定、重新考慮和古巴的關係等，將會冒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風險，特朗普應該會謹慎拿捏。

郝：特朗普不是政客，而是商人，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他的商人特徵。即是說，他沒有理念，他不會爲了一個理念、一種價值，很執着地去制定一整套的政策，也就是說，他的對內對外政策都會帶有很大的隨意性。這種隨意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會是一種利益導向，因爲他是商人，他要計算成本和收益，他的計算裏可能會有政治上的考量，因爲他畢竟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從他對政府官員的考量和任命上能看出這一點。不過，雖然他有其雄心壯志，但顯然沒有一整套思維縝密的政策邏輯，而且他也缺少美國知識精英的支持。如果說每一個總統都有一個學習期，特朗普的學習期可能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代價太大，他的“不拘一格”可能會擾亂美國人花了60年建立的現有體制，而擾亂之後他才會慢慢地瞭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是說，這個商人的學習過程需要別人付出很大代價，這就是爲甚麼很多人說，特朗普當選後，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後感到後悔。然而，他會不會製造出一些麻煩出來？這個倒是有可能。現在，一些學界和公眾輿論都認爲，美國的政治體制比較完善，特朗普不會越雷池“兩步”，只可能越雷池“半步”，我不太認可這種說法。實際上，我認爲美國的這套體制給了領導人相當大的迴旋餘地，當然他不會做出顛覆美國憲法的事情，但是會造成很大的損害，特別是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他可能會製造出一些麻煩來的。國內政策方面，可能只是引起國內百姓或一些公眾輿論上的不滿或讚揚，但是在國際上會牽涉到另一些國家、盟國，或一系列國家的關係，其可能產生的後果未必是這樣一個商人現在能理解的。這就是爲甚麼現在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對特朗普仍感到某種程度的不安的原因，如果他們真的那麼相信美國的體制，沒有人會覺得不安，不管是張三或李四上台，美國體制都會限制他們。但爲甚麼現在大家都有點不安呢？因爲這個領導人的個人行爲有時甚至可能比體制強。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他能輕易地顛覆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中美關係當中的根本機制。他這麼簡單地便與傳統的做法切割，不能說沒有影響。

王：我稍微補充一下，美國大選選出來的總統，一般情況下都還是體制內的人，他不大可能去顛覆這個體制。美國的體制具有很強的力量來制約當選的政治人物。奧巴馬競選時也高唱變革口號，但上台後發現有很多事情做不了。例如他競選時便說要關掉古巴的關達那摩灣

（Guantanamo Bay）監獄，但八年後的今天還沒關掉，他的移民改革法案在美國國會也屢屢碰壁，TPP簽字之後在國會也通過不了，他的中東和平政策也因為國內的牽制而功敗垂成。當然，他還是做了一些跟前任政府不一樣的事情，如跟古巴建立外交關係、簽署氣候變化協議、和伊朗達成核協議等。因此，總統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還是有限度的。為甚麼其他國家領導人會比較擔心特朗普呢？因為他完全是體制之外的人，不知道規矩方圓，所以他上台以後，就像郝教授所說的，第一階段會有很強的改變現狀的衝動，可能會為所欲為，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但我想他一定會很快地受到這個體制的反彈，包括國內體制和國際體制的反彈。經過一段時間的較量以後，他可能會像他的前任那樣，慢慢回到這個體制的中間點來。特朗普會不會成為一個能夠打破美國現存體制的總統？我個人還是有懷疑的，我覺得不太容易。

郝：美國體制其實是頗為健全的，且不說它是否健康，但它還是很健全的，其內部有很大的穩定性。特朗普之所以有如此“不拘一格”的可能性，是因為他不是體制內的人，體制內的人上台後首要考量的是要再次選舉連任，這樣他就必需考慮民意，做很多取悅民意的事，這是政客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特朗普呢？我們不能以一個傳統政客的角度去衡量他，他不是政客，而是商人，對他來說，這個世界上他甚麼都有了，金錢、權力、地位、榮譽都有了，他可能不會在意是否連任，那就使他可能不同於其他總統，不管是小布什、克林頓或奧巴馬，對想要連任的人，這個體制都對其有一些限制，但對一個可能不想連任而想為所欲為的人就難說了。當然，他現在有一個想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的想法，說不定也想青史留名，認為四年的時間不夠，這樣他就有可能低下頭來在體制內去運作。

王：我想說，現在不單是民主黨反對特朗普，現在連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支持也不那麼強，是否會全力支持特朗普施政，也是未知之數。共和黨的一些主流精英對特朗普當選本來就心存疑慮，競選期間，共和黨的大佬們，幾乎沒有不給特朗普罵過的。現在特朗普贏了，成者為王，這些大佬們當然不得不出來支持他，但這不等於他們會全盤接受其政策主張。如果他太出格的話，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還是可以限制他的決策自由，美國國會會有這樣的權力，所以他自己也需非常小心，其重要任務是要修復和共和黨主流精英的關係，以確保他們的支持。

陳：特朗普尚未執政就打破慣例，和台灣地區的蔡英文通電話，同時還意欲挑戰“一個中國”政策。他在進行這些事之前，他或他的團隊是怎樣想的？你們認為特朗普時代，中美台關係會如何互動，台海會再次爆發危機嗎？

王：在打這通電話之時，特朗普尚未就職，那時整個體制對他的限制不多，他作出這個決定，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受他身邊團隊的影響。特朗普本身對外交毫無經驗，完全不熟悉美國和其他國家通過多年互動而建立起來的一套行為方式。他暫時可能只有一些諸如“讓美國重新強大”的想法，而沒有一整套的外交政策，因此，他身邊的一些政策和外交智囊便變得非常重要。在與蔡英文通電話這件事情上，他很明顯地是受到了周圍一些比較親台或比較反華的外交政策顧問的影響，他本身對台灣問題未必很關心，不太可能是自己想到要去和蔡英文通電話的。

亞如果這一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注意雖然特朗普本人可能不一定非常親台反

華——畢竟他跟中國也有不少生意上的往來——但他身邊或共和黨內部的一些主要的中國或亞洲問題專家和學者親台的比較多。所以特朗普的對華對台政策可能會較多的受到他們的影響。不少共和黨的中國問題專家本來就認為美國多年來的政策太偏向中國大陸、對台灣不公平，應當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狀況。特朗普的對華對台政策取決於其外交和國安團隊對他的影響程度，要看他身邊主管中國東亞事務的是哪些人——而有趣的是，他提名的美國駐華大使、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對中國卻相當友好，跟習近平也私交甚篤。然而，美國國內特別是共和黨內部確實仍有一股親台的勢力，這股勢力在特朗普身邊應會抓住機會、想方設法加強和台灣的关系，而這勢必會影響美國和大陸的關係。剛才已經提到，特朗普本身未必瞭解箇中輕重，才會把“一個中國”原則解讀成是可以談判的——意思是說如果要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那麼中國在經貿、南海等其他方面就需作出讓步——他把它變成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東西，盡顯商人本色。但對中國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一個中國”是一條絕對的底線。一般來說，從尼克遜總統開始，所有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對這一點都非常清楚，但特朗普他不清楚。因此，他的一些謀士有可能會利用這一點來弱化“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和台灣的关系。舉例來說，如果是老布什，他雖也是共和黨人，但他肯定不會受其他人影響去做這樣的事，他明白這當中的利害關係及會引起的後果，這會激起中國非常強烈的反彈，對美國有害無益。所以我認為在特朗普執政第一階段，他的外交國安團隊對他的影響會比較大，對這一點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

關於中美台的三邊互動，由於現在蔡英文當局正處於內外交困時期，所以她會非常想要拉近和特朗普政府的關係，這也符合特朗普團隊一些親台人士的願望。如果雙方一拍即合，可能引起中美台關係的一些波動，例如蔡英文可能會藉訪問邦交國過境美國、想辦法與特朗普的團隊成員見面，進行一些實質性的交談。當然，光靠雙方的一通電話不可能改變中美台三邊關係的大格局，它更多的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而中國對此卻十分在乎。講到這裏，又可以回到現存體制和格局對特朗普的制約的問題上來。我認為，我們一方面不能排除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會做出一些與以往各屆政府有異的行為，對中美關係造成干擾乃至衝擊，但是他會在多大程度上放棄“一個中國”原則，顛覆中美台互動的基本格局？套用一句英文來回答：“Possible, but unlikely.”

郝：王教授的分析很有意思，我也來說說我對這的理解。我認為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可能會出現一種新常態。這是一個怎樣的新常態呢？這是一種在不穩定、不確定的大環境下，中美需要磨合一段時間的新常態。我想，未來兩年中美關係恐怕會烏雲密布。從現在特朗普任命的一些國安、外交團隊能看得出來，他們對中國實際上並不友好，可能會在特朗普的對外關係當中，把中國挑出來作為一個主要的標靶。特朗普想要振興美國，他可能需要樹立一個外部的敵人。同時，他需要使用一些打破常規的辦法得到一些利益。我們知道，中國在美國的外匯儲備將近有三萬億美元，中美貿易佔了那麼大的一塊，中國在資金方面的充裕，特朗普肯定是知道的。那麼他在振興美國的計劃當中，如果想挑出一個假想敵的話，很有可能是中國。在奧巴馬時期，因為烏克蘭及克里米亞等問題，俄美關係十分緊張，特朗普上台後任命親俄的蒂勒森（Rex Tillerson）為國務卿，其實也釋放了一些信號，他想重新限定美俄關係，其原因也牽扯到中俄關係吧。美國



對外戰略的主要對手，冷戰期間是前蘇聯，冷戰以後一度是恐怖主義，那現在呢？恐怕在當前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中，初露端倪的美國全球戰略其實就是把目標對準中國。特朗普可能會“不拘一格”地來處理對華事務，對華政策恐怕也會險象環生。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係不僅不穩定，而且其不確定性會劇增，不管是經貿問題，還是南海、台灣地區、東北亞和東海等問題，中方可能都要疲於應付。對中國而言，如何穩定中美關係，應該具有很大的挑戰。

### 三、中美關係進入新常態

**陳：**面對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國內新的政治生態，中美關係的新變局，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如何既捍衛中國的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又保持中美關係不衝突、不對抗大局的穩定？中美在哪些領域可能繼續合作？哪些領域有可能發生摩擦和衝突？

**王：**現在，特朗普整個對華政策到底會走多遠，我們還不清楚，我們還得觀察一段時間。然而，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中國與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首要任務是要熟悉其幕僚團隊。有關特朗普本人，這麼多個月下來，我們基本瞭解得差不多，但對於他的團隊，很多人都不大熟悉，因為他起用的那些人都不是以前熟悉的主流人士。共和黨內部的一些主流精英基本上都對特朗普沒有好感，甚至在競選時聯名上書反對他，當中包括了一些相對溫和和主流的中國和亞洲問題專家，他們未必願意或能夠進入他的團隊，因為他只能找一些非主流，甚至比較極端的人士。因此，需要好好研究這個團隊，包括他們的理念、經歷、政策主張等，只有這樣才能預測他們會在對華政策上作出甚麼樣的舉動。至於應對方面，我認為中國應當沉着應對。特朗普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正好相反，奧巴馬上台後的第一年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交接和開局都非常理想，這一次開局可能會比較艱難、不平靜，不排除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小危機，包括在貿易問題上，他可能宣佈一些對中國不太有利的措施，中國應當沉住氣，不能事事都高調地作出反應。他可能會說出一些看起來頗具威脅性的話，但我們要看看他背後是否具有有一些相關的政策再作決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得很對，我們不是看他的個性，不是看他的個人行事風格，甚至不是太看重他的言論，而是要看他可操作的實際政策。特朗普是個大嘴巴，喜歡在推特上放話，如果我們把他的話句句當真，次次都要跟他計較，那是沒辦法跟他打交道的，也正好落入了他的套路，被他掌握了主動權。

剛才講到，他可能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學習時期。那樣的話，他跟其他的新總統就不一樣了。到目前為止，他在內政外交上都還沒有一套完整連貫的理念或套路，他的團隊本身很多人在政策理念上相互都不大切合，例如，他任命的國務卿主張自由貿易，而其他幾個經貿官員則非如此。他的團隊成員之間也需要時間來調整彼此的理念，然後才能提出比較一致的政策主張。不僅中美之間需要磨合，特朗普政府內部也需要磨合。因此，我主張要給特朗普一點時間。在他剛上台後的一段過渡時期或政策形成期內，要避免去刺激他，對他的一些言論也無需作出過度反應。

**郝：**在應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上，我與王教授有稍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中國應該注意三個方面。其一，對可能出現的狀況列出一張應對清單，並在某些特殊的項目上適度地增加反應

的強度，因為特朗普現在還在學習階段，如果中國過份容忍，特朗普只會越來越囂張，對付一個商人，一定要讓他知道痛處，商人是沒有軟肋的，特別是他這樣，一定要給他劃定規矩。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同於20或10年前的中國，2016年的中國早也與1996、1986年的中國很不一樣。今天中國的實力，以及在很多方面的抗壓能力已經非常強，當然，也不是要去跟美國較勁，但在很多方面是不需要過份保守的。在經濟領域的抗壓方面，中國手中其實有很多影響力，例如，在對華貿易問題上，美國的跨國企業都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不管是波音、可口可樂、蘋果、麥當勞等，都在中國有巨大投資，如果中美要打貿易戰的話，美國的大型企業大都會受到傷害，它們肯定會利用美國國內機制來防止出現這種局面。實際上，我不太同意中國要事事容忍特朗普，他這個人不按常理出牌，這方面大家都很清楚，在擊退希拉里的選舉中，他的策略比較奏效，實際上增加了他的狂妄自大，現在全世界都在不安地觀察着他，他的團隊似乎也認為別國一定要照顧到他的個人特點，對他要表現出相當的尊重和容忍，甚至覺得這是他的籌碼。特朗普的團隊公開說過，誰要是得罪他，他就要百倍地回擊。這就是在嚇唬人，他們覺得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得到預想的一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如果太過忍耐的話，只會縱容了他的狂妄，我認為要應對特朗普，就必需付出代價，因為現在不付的話，將來必定代價倍增，這條紅線現在不劃定，將來它不斷後退，最後恐怕就要突破很多底線了。如果特朗普能在台灣問題上突破中國的底線，將來他可能也會在港澳、西藏等一系列問題上衝擊中國底線。也就是說，要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我們現在付出代價是為了減少未來更大的代價。

其二，現在處理中美關係的一個大思路，當然是不要和特朗普團隊作對，因為其實要與一個商人交往，當然要在商言商，說不定還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機會。美國甚至特朗普個人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投資，很多商人會去遊說他。在中美關係的穩定中，商界一直是一塊壓艙石。因為在一些強硬的對華政策面前，大概只有像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這樣的軍工企業能夠受惠，絕大部分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跨國企業則不然，因此它們肯定會去遊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資利用的資源。我認為在中美關係的總體處理上，要學會利用美國的遊戲規則，即是說既然你是商人，就要抓住商人的軟肋，哪些能讓商人感到壓力和痛楚的，中國都可考慮利用。當然，我絕不是說我是鷹派，這也不是提倡對抗，而是想辦法加以周旋而已。

其三，中國恐怕是要趕快做好自己的事情了。中國現在剩下的機會窗口已經不多，而且可能很快就會關閉。在未來五年，中國要趕快進行自己的內部結構調整。特朗普這個外部的壓力，如果能夠巧妙利用的話，可能會轉變成促進國內改革的一個動力，使國內整體的結構更趨合理。中國體制內尚有很多的制度紅利，要盡快釋放出來，同時還要發展軍力。舉例來說，2012年的日本釣魚島國有化事件啟動了中國大幅度的軍事現代化。事實上，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中，軍事現代化是最後一項，一直放在角落裏面，因為釣魚島事件全力衝刺了，現在中國的軍艦下海就像下餃子一樣，這個變化是被刺激出來的。特朗普上台後的外部挑戰實際上都能轉化成機遇，中國要自己去轉變，外國是不會給中國機會的，因為中國是它們的競爭者。總體來說，應對嶄新的中美關係，第一是不能怕他；第二是要想方設法瞭解這個商人的特點，然後加以利用；第三是要趕快

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最後，特朗普的全球戰略可能會留下一些空間，中國在外交上——即在大格局上是可以利用的。

王：在宏觀上，我跟郝教授的觀點其實是一樣的，我們當然不能懼怕特朗普政府，我們要想辦法來從容應對，且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我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我認為中國要有做好去面對最壞可能的準備，要有一個計劃清單，即是說，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這些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例如台灣問題、南海問題、貿易問題等，中國如何去對付他？在這些方面絕對不能示弱。但中國的文化還是講究後發制人的，中國不會去挑起事端，激怒特朗普政府，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要保持一種所謂的戰略定力，對於他們的一些挑釁性言辭，絕不能按捺不住地去和他們打口水仗，特別是在特朗普上台的初期。為甚麼呢？因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還沒有定型，在政策還沒定型之前就去四面出擊、強烈反應，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他需要時間去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亞太戰略和對華戰略，中國要給他這個時間。

當然，中國也不是要消極去等待特朗普政策的形成，甚至可以想辦法去塑造他的對華政策和亞太戰略。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需加強和特朗普團隊的溝通，想辦法讓雙方的最高領導人盡早會面。2009年奧巴馬上台後的首年，奧巴馬訪問了中國，對雙方關係的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國可以主動一些，應主動地想辦法和他的政府溝通。特朗普是一個商人，個性比較率直，愛恨分明，中國領導人如習近平也有這麼一個特點。如果兩人見面，應能讓特朗普感受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並沒有敵意，中國還是希望加強和美國的合作，不單是在雙邊關係上，還有許多全球熱點如中東、反恐、敘利亞、防核擴散等問題上，中美之間都有很多合作空間。應對特朗普，要進行“預防外交”，不能一味消極等待。

中國也要做好和特朗普較量的準備。因為特朗普的個性和他現在在外交團隊的一些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屬於所謂的“鷹派”，是比較強硬的。但在目前階段，擺出姿態跟他去對抗，我認為為時尚早。特朗普在台下的言論與他執政時的行為，一般來說應有所不同。他畢竟有一個國家在手，已不能隨便講話、隨便做事，美國國內也有很多制約他的力量。做好準備不一定說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最壞的結果來作打算，中國還是要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果，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商人的觀念很容易形成，也很容易改變，它並非根深蒂固。我認為他在對外關係中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貿易問題。就中美經貿關係而言，他一直認為美國吃了很大的虧，要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這也是他這次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認為他應該不會馬上對中國採取非常嚴厲的懲罰性手段。特朗普可能會像克林頓一樣，在競選時說話比較狠，說如果中國不改善人權，美國就要取消其最惠國待遇，而在上台後則往後退了一步，說會給中國一年的時間來改善人權，如再不改善，就要取消云云。如此就為雙方爭取了一個緩衝期，在這一年中，美國的很多大公司就去遊說國會，對克林頓政府施加壓力。一年後他可能也認識到這種做法不符合美國利益，最後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判斷，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會說，中國需要如何如何，如果不這麼做，美國就會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對中國的產品徵收百分之多少的關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要和美國進行非常認真的談判，在某些問題上可能要作出一些讓步。就像中國加入世貿一樣，外部壓力可能會促使中國改善國內

的經濟結構，加速經濟轉型換代。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歷史上也出現過多次。奧巴馬政府時中美的貿易摩擦其實也很厲害，美國經常對中國的產品提出反傾銷指控，增收高額關稅。但是在每次大的貿易戰前夕，雙方往往都會妥協，達成一個協議。中國應該要做好跟美國進行艱苦談判的準備，雙方都有底線，但其實雙方也還應該有讓步的空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初最關心的應該還是美國的經濟問題，例如，如何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振興製造業、改善基礎設施、降低對外貿易赤字等。如果中美能夠在這些問題上通過妥協而進行合作，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特朗普對中國的偏見，從而延緩或避免兩國在一系列地緣政治和安全問題上的衝突。這種以經貿換安全的思路或許可以考慮。

總之，中國要有一種後發制人的定力，特別是因為特朗普是一個新手，他的很多政策還沒有完全形成。如果他就職後繼續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推行不負責任的外交政策，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再和其他國家一起來對付他，也為時未晚。但是，就像我前面說的，特朗普擔任了總統，其言行應會有所收斂，畢竟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可能就在他一念之間，這不是兒戲，我希望他能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據說，他在拿到核按鈕密碼的一瞬間，突然感到很害怕，這說明他還有敬畏之心。上世紀20、30年代世界金融危機造成大蕭條，一些國家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而美國在那種情況下還是能夠基本上維持其民主體制，沒有出現像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如此看來，這個體制本身對領導人還是有一定約束力的。當然，如果特朗普這樣一個體制外的人物，秉承他作為商人某些玩世不恭的特性，上台後不想好好幹，只想過把總統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認為他既然當選了，他還是想要有政績、把這個國家搞好的，如果他想要這麼做，就應該不會太出格。當他的政策還沒有完全成型的時候，急着去拉開對抗的架勢，這樣只會證實了他和他的團隊那些強硬派的想法：中國就是要跟美國對抗，中國就是要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這樣的話，他們後來形成的戰略、政策肯定會對中國的長遠發展不利。因此，對特朗普政府，我們一方面不應抱太多幻想，要準備好和它較量和博弈；另一方面也不能放棄影響和塑造其對華和亞太政策的機會，以盡量減少對中國重大利益的負面效應和損害。

#### 四、中美關係變化對澳門的影響

**陳：**最後，我想請兩位談談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局對澳門所產生的影響。澳門是個彈丸之地、一個微型經濟體，特朗普成為白宮的新主人對澳門有甚麼影響？

**郝：**中美關係如果惡化，會影響一些地區性的國際形勢。舉例來說，東南亞、東亞都會受到影響，將對該地區的經濟造成衝擊，從而影響澳門的旅遊博彩業。作為一個外向型社會，國際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澳門這樣一個以旅遊博彩業為主體的微型經濟體。而在直接的影響方面，主要體現在澳門經濟具有相當的國際化成分，美資對博彩業有一定比例的貢獻，如果中美真的出現諸如貿易戰的情況，澳門的博彩業可能會受到影響。十多年來，美資對澳門博彩業的國際化有一定貢獻，但其膨脹性增長也對澳門發展適度多元的經濟有一定的衝擊。過去由於中美關係相對平穩，美國賭資未被納入到考慮的因素之內，如果中美關係出現較大幅度的振盪，澳門特區政府是否需要配合中央政府，對美資進行一定的規管？這真的很難說。當然，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機會

也較小，但不是沒有可能。

此外，美國也可能會出台一些對澳門不利的政策，以期對中國施加壓力，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使用甚麼手段都是有可能的。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宏觀對華政策也包含着港澳台政策，也希望可以影響港澳政治的走向。對港澳的立場和政策，美國有其考量，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部分。

王：澳門是一個微型的經濟體，但又是中國的一部分，澳門和美國的關係總體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澳門在地理上處於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在歷史上，其對中美關係也曾發揮較為特殊的作用。此外，澳門是一個非常開放、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風吹草動，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具體來說，澳門現在有非常巨大的美國投資，美資對澳門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美關係轉差，可能會影響美資的投資信心及其運作。其次，雖然澳門的對外貿易非常有限，但美國作為澳門的主要出口國家之一，如果中美真的開打貿易戰，可能也會波及澳門。另一方面是美國對港澳地區有特殊政策。澳門回歸之後，美國通過國會立法等手段，試圖影響澳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有關澳門人權狀況、宗教自由、販賣人口、洗黑錢等問題的報告。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趨強硬，美國國會很可能會在港澳問題上採取更加強硬的做法，就上述問題提出更為嚴厲的批評，向港澳政府施壓。最後就是南海問題。現在，很多人說中美之間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就是南海，甚至有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在那裏爆發。澳門地處南海北岸，中美如果真的不幸在南海兵戎相見的話，從地理上來說，澳門難以置身事外。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戰爭可能離澳門並不遙遠。從上述這些方面來看，誰入主白宮，以及由此產生的中美關係的新走向，對澳門必定會有影響。因此作為澳門的學者和居民，我們也要關注中美關係，為穩定中美關係的大局作出我們的貢獻。

（本文談話錄音由柯慧玲整理，訪談時間為本年1月）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